

方寸闲章见乾坤

——康熙乾三帝闲章中的精神世界

□ 鲍家树



八徵耄念之宝

》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三代皇帝的闲章样式和印文内容。乾隆曾言，“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可见闲章之寓意，名在章，实在文。

敬天勤民，祖述尧舜

古人认为，帝王是仰承天命来治理国家的。天人之间相互感应，如果帝王崇德象贤，则会祥瑞相伴；假如帝王无德作孽，则会天降灾异。古代皇帝自比天子，所谓“敬天”，即要依循天道来治国而不能有所忤逆。同时，要“勤民”。在三帝的闲章之中，多含敬天勤民的思想，如“保合太和”“建中于民”“信天主人”等等。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康熙心神不宁，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便立即諭示百官，要倍加警醒、留心民事。“兹宜各殚乃忱，共勤实政，以为修珥之道”。雍正即位之初，畿辅之地多因降雨而被淹，雍正官中“虔祷上天，中夜屡起，瞻望云色，以卜晴雨。祈祷之时，尝终日饮膳不御”，可见其敬天之诚意。乾隆自号“信天主人”，主政期间，恪守祖、父敬天勤民的理念，“仰荷上苍嘉佑”，三次晋免地丁钱粮，两次蠲免各省漕粮，而且未再增加赋税，使得“府藏殷实，国用充饶”。

除了对天道神灵的尊崇，康熙乾三帝还积极效法华夏先王尧、舜、禹的为君之道。在“惜寸阴”“惟尧则之”“惠迪吉”“协和”“用中”“精一执中”“执两用中”“所宝惟贤”等闲章中均有所体现。

舜、禹都是惜时的典范，舜“鸣鸡而起，孳孳为善”；禹珍惜每一寸光阴，“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除了珍惜光阴，尧、舜、禹的亲贤尚贤之举、精一用中之道等，三位皇帝同样向往、追求。尧统治时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

重视贤达，将王位传给舜，有“禅让”之举，舜多次称赞禹最为贤良，继而传位给禹，使这一古史佳话得以承续，更留下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箴言。对于这一理政心传，三帝中，尤以乾隆恪守厉行，“朕为天下主，惟有执两用中，期与天下臣民休养生息”。

为君不易，克崇实政

如果说“敬天勤民”“祖述尧舜”还带有宣扬正统性、合法性意味的话，“为君难”的慨叹和“崇实政”的作为则更为真实。为君之难，康熙深有感触：“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这些论述，既表现出一代帝王的慨叹，同时也表明了纵万难之下亦要勤勉严谨之志。

相比康熙、乾二帝，雍正的即位过程是一件历史公案，在当时就颇受质疑。“为君难”更是雍正的内心真实写照。雍正即位后，关于其篡位的议论，朝野上下、京城内外沸沸扬扬，“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负面舆论甚嚣尘上。为了辟谣，雍正亲自组织编纂《大义觉迷录》，剖示心迹，“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然而在其执政期间，怀疑和议论却未曾停止。

为溯本清源，雍正执政过程中不尚空谈、克崇实政，今有“崇实政”“朝乾夕惕”“兢兢业业”等印文传世。“崇实政”，意即为君为臣者要关心国计民生，要解决实际问题。雍正曾諭令，“古之纯臣，载在史册者，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而“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则更为准确地体现了雍正的勤政，“自朝至夜，殚心竭虑，暑刻靡宁。无非欲休养民生，澄清吏治，使中外永享升平之福”。面对浩繁的奏折，雍正坚持亲笔批阅，甚至工作到凌晨。

克崇实政的理念在乾隆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乾隆有“敬胜怠”等自警的闲章印文传世。乾隆极其自律，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记载，“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乾隆七十寿辰之际，刻有“古稀天子之宝”，配以“犹日孜孜”次章，并撰写《古稀说》以自诩。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他八十寿辰之际，刻有“八徵耄念之宝”，配以“自强不息”次章，并撰写《八徵耄念之宝记》。“八徵耄念”出自《尚书·洪范》，是上天赐予禹治理国家的九畴大法之第八——念用庶微，意即要关心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征兆，要对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有所准备。

余暇逸趣，书画遣怀

康熙乾三帝勤政非常，然而在日常纷繁的政务之余，会选择游心于文翰之间。在《石渠宝笈》收录的书画作品中，分别收录了康熙200多件、雍正50多件、乾隆2000多件作品。据《皇清书史》记载：“（康熙）万几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模，虽好慕不衰，然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

在闲章之中，除了“万几余暇”“几暇怡情”“救几清晏”，我们还能看到“偶然欲书”“意在笔先”“绘事后素”“比德”等诸多有关书画创作的印文。“偶然欲书”出自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是书法创作的“五合”之一，意指只有心无杂念，方能神融笔畅，进而创作出好的作品；“意在笔先”强调书画创作中构思的重要性；“绘事后素”蕴含了绘画的色彩观和风格观；“比德”意指物之自然美与人之品德美相统一等等。这些都是三位皇帝所认同的书画创作理念。

在书画鉴赏方面，“鉴赏”“雍正御览之宝”“朗吟珍赏”“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宣子孙”等有关鉴藏的印文也在书画中屡见不鲜。对于乾隆的艺术造诣、鉴定功底，后人多有品评，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对帝王的评价标准与艺术家应是不一样的，正如乾隆在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中题诗感叹的那样，“以斯精义入神思，为政施之岂致差”，假如宋徽宗能将对书画技艺的专注用在治国理政上，国家不至于败落到如斯田地。“天清地宁”“九州清晏”才是对帝王的要求，至于主业之余的闲暇抒怀，其水准如何，则不宜过于苛求。

闲章虽小，内涵丰富。透过闲章印文，我们能够从多个侧面窥见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精神世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三帝的政治追求和笔墨情趣。

“廉”与“贪”——几对用人标准的历史镜鉴（一）

□ 石志刚

古人对“廉”与“贪”这对关系有着很深的认识。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统治者在识人选人过程中，发现廉洁的官员是国家的财富，在守护百姓、促进发展、增强国家实力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发现贪婪的官员是国家的蛀虫，对百姓、社会、国家起着消极的作用。一旦发现廉洁的官员，往往会挖掘、提拔；一旦发现贪婪的官员，多数时候会斥责、降职甚至惩处。这样就会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能够更好地净化政治生态。

古代社会，有为的统治者对廉洁的官员非常敬重，注意发挥廉洁之官的能力、弘扬廉洁之官的品性，对于净化政治生态具有积极影响。南朝宋孝武帝时期，被任命为广州刺史的王琨，面对这一美差而没有产生贪念。因为广州当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远离京城、控制较松，一些在此担任官职的官员搜刮民财、勒索百姓，很快就会成为巨富，当时民间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说法。王琨却在担任广州刺史期间，“无所取纳”，非常清廉。等到王琨离任广州时，宋孝武帝“知其清”“为廷尉，加给事中”，提拔了王琨。能够做到自清、慎独的廉洁之官，对于纯洁社会风气、维系统治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廉为官，是有理想有作为有正确价值观的官员的为官目标。这些官员得到统治者认可、鼓励、支持，加之自身素养所塑造出廉洁清白的作风，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形成良好的为官规范。唐代名臣郑余庆从宰相职位上退下来后，“一日忽召诸朋朝官数人会食”。当时许多在朝官员“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诣之”。郑余庆在与众臣僚聊天过程中，把自己家仆叫过来进行吩咐：“厨家烂蒸去毛，勿拗折项”，众臣僚听了这个描述之后，“以为必蒸鹅鸭之类”，肯定是大餐，结果等到出餐的时候，“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郑余庆此举在警醒这些臣僚，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仍要食粗茶淡饭，才能做到廉洁从政。郑余庆的家风比较好，他的儿子郑浣亦是传承其父俭约之家风，“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郑浣虽身居高位，但是选任人员当官非常严格。“从父昆弟之孙”来投奔他，郑浣看到此人穿着朴素，行为粗

犷，想必是农家耕读之人，打算培养他。在一次聚餐中，郑浣发现这个“从父昆弟之孙”在吃蒸饼时，“掣去其皮，然后食之”，非常生气，将丢掉的蒸饼之皮自己吃掉，并严厉申斥这种纨绔之习，“赠以束帛，斥归乡里”。

如果在官场秩序中，认识不到官员贪腐的消极影响，势必对政权巩固和国家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所以，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官员贪腐的消极影响。有作为的统治者在发现官员有贪腐行为后，定会对其严惩不贷。这种严惩不贷的举措是看到贪腐对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危害后而采取的。在南朝齐世祖时，有一个典签叫刘道济，假公济私，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脏私百万”，齐世祖知道后，非常生气，“赐道济死”。康熙时期，出现了一个官场“双面人”，名字叫赵凤诏。赵凤诏对康熙大谈贪污之危害，“比之妇女失节”，受到康熙赏识：“尔言虽鄙俚，能如此存心甚佳。”结果，赵凤诏因“巧立税规，贪墨不识，受赃三十余万两”而被弹劾，康熙下旨彻查，赵凤诏贪腐属实，“风诏遂伏诛”。

封建社会中，如果统治者自身腐化，就会使得许多臣僚效仿，政权危亡之日就不远了，这就警醒历代统治者在识人用人过程中，注意惩治贪腐之人，才能确保清廉之风形成，进而巩固政权。如果统治者自身贪腐，就会恶化政治生态，形成鼓励纵容官员贪腐的环境。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非常俭朴，然而他的弟弟萧宏敛财如狂，财物装满30间房子，值“三亿余万”，被萧衍查出出来后，对这些钱财不仅没问，还赞叹说：“汝生活大可”。萧宏以房屋作抵押，搜刮民财，萧综实在看不下去，撰文《钱愚论》以讽萧宏。梁武帝萧衍知道后，不仅没有下令彻查萧宏敛财之事，反而禁止《钱愚论》流传。梁朝骤然勃兴，倏忽而亡，亦与此事有很大关联。可见，统治者是选用贪婪之人，还是禁用贪官、起用清廉之士，直接关系到社稷存亡，民众福祉。



□ 陈家兴

西晋真可谓成也司马炎，败也司马炎。不妨来看看，西晋是如何毁在司马炎手里的。

分封诸王又无力节制

就在265年司马炎登基时，便种下了大分裂的第一颗种子。当时，他为了汲取曹魏政权的教训，开始大封宗室，即所谓“帝懿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取任”。晋武帝一口气分封了27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允许诸王可自己选择封国中的官吏，后来又不断扩大诸王权力，以致最后酿成“八王之乱”。

到了277年，这第一颗种子开始被“施肥”催发了。这一年，卫将军杨琇等建议说，现在诸王公都在京城，无法拱卫王室，应当让他们回封地去。另外，异性诸将领居边，也应当有皇室亲戚参与。这意思很明显，就是相信宗室的力量，不相信异姓人。殊不知，治理失当，宗室一样可以为祸。

于是，晋武帝推行王国置军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分别配置不同数目的军人。居然允许各封国拥有自己的军队，这简直是昏招。诸王手中有军权，皇权力量强大时尚能节制，一旦皇权衰弱，诸王必然为祸。当时，诸王中任都督的，都让他们各自迁往封国以靠近他们的任所。当其时也，各位王公都留恋京师，皆涕泣而去。然而，日后祸乱京城，却又是另一番面孔。

立痴儿为太子

267年，在司马炎还未开启大一统的谋略之时，又开始种下大分裂的第二颗种子。这就是立他的儿子司马衷为太子。问题是，史称他这个长子是

谁是西晋政权的掘墓人——西晋迅速衰亡的思考（下）

个弱智白痴。史载其痴愚主要有两个细节：一是曾听青蛙鸣叫而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这个发问，今天仔细想来，倒颇有些哲学意味。二是有一年闹饥荒，百姓多饿死，司马衷听到后说：“何不食肉糜？”这就完全不通世情民情了。

事实上，晋武帝是有很多次机会换掉接班人的。但武帝的优柔寡断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时，晋武帝也觉得司马衷不聪明，担心他不能担当大任。曾经私下和杨皇后商议，皇后以“立子以长不以贤，也可动也！”暂时劝下了晋武帝的这个念头。到274年，杨皇后去世前，继续给晋武帝吹枕边风，为巩固太子司马衷的地位而努力。她病重时，担心武帝立一个贵嫔为后，会威胁太子地位。便头枕武帝膝盖，流着泪让他娶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武帝也是流着泪答应了。

在276年时，晋武帝曾病得很重。这时朝野上下都归心于司马攸。司马攸平素憎恨荀勖，荀勖便让人对晋武帝说，陛下前几天病若不愈，齐王司马攸“为公卿百姓所归”，太子虽然打算谦让，但也免不了祸患。结果司马攸从此就靠边站了。

到了278年，“朝野咸（都）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担当大任）”。卫瓘装醉向晋武帝提出含蓄建议，拍着武帝的床说：“此座可惜！”武帝知他用意，却也含蓄地表示不愿采纳：“公真大醉邪？”卫瓘从此不再提起。

但是武帝却搞起了自欺欺人的游戏。他把东宫的官吏都召集起来设

宴，然后把尚书难以决断的事情密封起来，让太子来决断。明知是个痴儿，还要去试，武帝也是痴了。以为这样就可以判断太子行与不行，武帝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他忘了还有一个贾南风。太子妃贾南风风闻消息，便请给使张泓捉刀，让太子亲笔抄录。武帝看了非常高兴，首先就拿给卫瓘看，卫瓘大为不安，结果大家都知道卫瓘和武帝说过关于太子的事。贾充派人对贾南风说，卫瓘这个老奴，差点破了你家！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情令智昏，同时还把良臣出卖了。

政风奢侈，贪污盛行

天下太平之后，晋武帝就开始怠于政事，把很多时间花在游乐、宴饮上，致使政风奢侈，贪污盛行，同时又宠用奸佞，最终必然导致人心不附，这可称得上大分裂的第三颗种子。从历史上看，太平盛世有没有忧患意识，可以说是检验历代君主是否为雄主的一块试金石。“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西晋之迅速衰亡，与此有着莫大干系。

271年，司马炎的宠臣贾充开始为祸朝野。晋武帝之所以宠爱贾充这样的奸臣，原因是他能成为太子，贾充起了很大作用。念旧是人之常情，但宠之而乱政，则显然是因小失大。

贾充“为人巧诌”，在朝中结党，搞得乌烟瘴气，上下都很憎恨他们。晋武帝问侍中裴楷朝政得失，裴楷直

言朝中有贾充之徒，以致武帝的德惠比不上尧舜。

政权稳固的短板

西晋大分裂的第四颗种子便是太子妃贾南风。她比太子大两岁，“妒忌多权诈”，弱智太子又岂是她的对手？史称司马衷既爱她又怕她。

272年，忠奸继续斗法。因为贾充与任恺都受晋武帝宠任，但贾充想专宠又嫉妒任恺，于是朝中官吏开始分成帮派，各有依附靠山。晋武帝一看平衡术玩出了毛病，就把两人召来请吃了一顿饭，当和事佬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这简直有点可笑。忠臣之间矛盾，双方可以坐在一起化解，但忠奸之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武帝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武帝知道了他们不和，却又不责备，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外相崇重，内怨益深”。后来，贾充推荐任恺担任吏部尚书，任恺见武帝的机会就变少了，贾充常在武帝身边，就和荀勖等人一起构陷任恺，于是任恺获罪被废在家。这就是玩平衡术的恶果，毕竟居上位者也是人，小人常在身边，贤臣却常不在，难免就偏听偏信了。这正是为什么诸葛亮要劝刘禅“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因所在。

到了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让大分裂的第三颗种子加速催发。281年，他把孙皓后宫的5000宫女悉数收纳，致使后宫妃嫔近万人。后宫如此众多，这在历代帝王那里，都极为罕

见。“羊车望幸”的典故，就是晋武帝制造的。妃子多了，到哪里住宿就是一个难题，估计武帝心里也很是烦恼，便想出一个办法，坐着羊拉的车子，凭凭羊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宴寝。宫女们为了得到宠幸，便以竹叶插门，盐汁洒地，因为羊喜欢盐水的味道会停下吃食。

这时候，皇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开始当权，势倾内外，旧臣则被疏远。政事荒疏，祸乱必深种。而历史上著名的石崇斗富也出在晋武帝任上，成为“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这一警语的深刻教材。

当时，羊琇、王恺、石崇三位高官，互相攀比谁最奢侈。王恺用糖骨刷锅，石崇就用蜜蜡当柴烧。石崇用花椒粉和泥砌房，王恺就用赤石蜡涂墙。晋武帝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助长这种奢侈之风，赐给外甥王恺两尺高的珊瑚树。

奢靡之风如此盛行，必然导致腐败盛行。贪污成风，这些高官又哪里去获得这些东西呢？除了贪腐，别无他法。

在“大康之治”这短暂的盛世开启之时，大分裂的第五颗种子却开始生根。这颗种子原本不是晋武帝种下的，历史也把机会送到了晋武帝面前，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汉、魏以来，羌、胡、鲜卑等投降的部落，大多居住在关塞之内各郡，后来多次因不满和怨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这时，侍御史郭举上疏献赶走之策，但晋武帝不听，终致这些少数民族趁“八王之乱”、西晋国力衰弱之际

开始举兵，在北方陆续建立了16国。

290年，晋武帝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为晋惠帝，立太子妃贾南风为皇后。从此，大分裂的五颗种子陆续发芽，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大分裂。大体过程是这样的：司马衷痴愚，导致权力失控，《资治通鉴》称“由是权在群下（手下小人），政出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为除掉权臣杨骏等，司马玮、司马亮等八王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贾南风淫乱暴虐，八王也胡作非为，没一个是干大事的人；而后即有“永嘉之祸”，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司马炽。一直到316年西晋灭亡，这一段历史乱哄哄，不忍卒读，不忍详述。

在大分裂的五颗种子中，大封宗室、立司马衷为太子、让太子娶贾南风、少数民族祸乱，固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乃是第三颗种子——政风奢侈、贪污盛行、宠用奸佞。因为政风奢侈、贪污盛行，使人心不附。而宠用奸佞，必然使贤臣靠边站，结果就是：平时时，无忠臣维护治理秩序；危难时，无良将挽狂澜于既倒。人心涣散，执政基础就如沙上建塔，鲜有能持久的。

历史表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自警、不自新，再强大的政权也会走到穷途末路。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政权兴怒，对后世更具有警示意义。因为它深刻表明，政权的稳固，同样遵循短板理论。并不因为你任上有一番文治武功，你的国祚就会延永下去。相反，治理中的那些昏着败笔，就是政权稳固的短板。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改正，就会给后代埋下深重忧患。

